

风景的 重新发现

fengjingdechongxin
faxian

内地语境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

颜敏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景的 重新发现

f e n g j i n g d e c h o n g x i n

faxian

内地语境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

颜敏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的重新发现：内地语境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颜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 - 7 - 5161 - 6157 - 9

I. ①风… II. ①颜…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
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51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研究及史料整理”
(12YC751094) 成果。

自序

柄谷行人在探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反复提及“风景”的概念，在他看来，“风景”指的并不一定是名胜古迹，而是在特定时空被凸显的新事物新现象；风景的发现，往往与风景自身无关，而与发现者认知装置的变化及塑造这一认知装置的时代语境有关。他甚至断言，风景之所以为风景，是缘于“内在自我的出现”，正是在新的自我意识之中，外在的景观被整体化、自我化了。循此推及“汉语文学”之类的整体性文学想象，也可归纳为富于“风景性”的现代性景观。时间起点可以是“五四”，更应是晚清。当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以维新改良为己任，在本土以外办报办刊、兼兴华侨教育之时，汉语文学就与民族国家合体，成为整体性想象的媒介与结果。同样，“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具有整体化意味的文学指称的出现，亦可遵循这一思维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内地的特殊语境进行关联。在中国内地，70年代末被称为新时期的开始，所谓新，不仅指具体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外在变革，也指的是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再铸造。更确切地说，是先倡导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有持续开放改革的可能性。具体到文学及文学研究层面，则是作为接受主体的内地文学界和学界，因本身认识装置的变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才获得其存在价值。30余年来，从港台到台港澳，从台港澳到海外，从海外到世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可谓被不断重新发现的风景，它的特性价值、言说方式与策略均因研究主体的认知游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学术研究本身，亦已成为了风景。

在当下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反思思潮中，在建构宏大

历史叙事的学科化诉求中，我们需要明了自身研究的风景区性质。把握这一风景的特性，可以是直接的梳理，如对研究史做史料式整理和诗学性反思，这是当下卓有成效的一种思维。也可以是间接的阐释，如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视野中触摸这一研究领域崛起及发展的时代风气及诉求，这类跨学科研究也已起步。但是，既然风景的根源在于主体认识装置的变化，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反思就有必要将目光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者本身，最简单的提问方式是，内地研究者为什么会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呈现或造就了怎样的自我形象？这种提问方式其实是立足精神史的角度，探寻研究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带着心灵被触动时的温度。

研究者的个体形象和群体形象，大抵可理解成具体学人和学术共同体的两种形态。首先让我们从具体学人尝试建立探讨问题的一种路径。为了言说之便，不妨以进入本领域已近13年的“我”作为样本加以透视。就我而言，当初研究对象的选择带有几分偶然，却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迷恋作为动力。从湖南蓝田的山里走出来，选择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选择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是将自己封闭渺茫的生命托付给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跟着导师结识了诸多境外的作家、学者，无数文字雕刻的远景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生命存在，那种心跳的感觉至今难忘。然而走过一段研究路途后，我陷入困境，而当同窗好友们嘲笑我研究的印尼华文文学幼稚可笑时，当敬仰的老师警告我此路不通时，我几乎就要绝望。我开始思考，这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当年尚未入门的我，带着这样的困惑，着手回溯整个研究领域的源头。在查阅了大量的期刊资料，也阅读了前辈们的综述性文章后，我发现，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和我的生命历程是可以叠合的，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的时间点，也正好是这一领域开始萌动之时；其中所敞开的时代波折与时代感性，似乎也以不同方式渗透于我的生命历程之中……反思回望中，我带着犹豫的心态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多了一份情感的投入。时光飞逝，在后继的十多年里，我参与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认识的境外作家越来越多，熟悉的同道也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成为这个圈子的一部分，尽管并不起眼，默默无闻，却获得了一份存在感，我已下定决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当初的迷茫和犹豫彻底消失了。

如果说学术研究的最低境界是求“放心”的话，那么，我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个案证明，很多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人，就算他很难在其中找到与自己生命契合的关节点，随着光阴的荏苒，也会逐渐在这一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自我认同，从而使得相关的学术研究成为其内在生命不可或缺的成分。

倘若学术研究是“天下公器”、闲人不得入内，那么获准进入本研究领域的人，就要接受另一种考验。此时，我们不能只关注个人的选择历练和心灵动荡，而应该客观考察研究者的学术成绩和影响。在这种观察中，学术共同体变成了不断重组变化的流动结构，再次向权力与制度倾斜。不难看出，内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以下几类人容易占据有利位置。一是先行者的优势，一些率先进入本领域的学者，由于他的率先垂范，慢慢占据了一个前辈的位置。二是沿海学府与研究机构有优势，因为他们与台港澳海外有着天然的地理联络优势，来往密切，资料占有较为丰富，研究成果容易面世。最后是才华超群者，他借助上帝给予他的智慧，事半功倍，不知不觉成为本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而不属于这三类优势群体的研究者，就处在金字塔的底部，他们的学术生存状态无声无息，却自有衬托他人的基础性意义，因为群星闪烁的天幕下，必然需要默默无闻的尘埃。然而，任何研究者的前面都有需要仰望的星群，所谓学术研究中的“破”的力量除了学术本身要推陈出新外，也源于研究者改变自身存在的上位冲动。于是乎，这一学术共同体围绕着团体职位、学术成就、代际更替等形成了不断往前的洪流，在共同建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之时，也旁枝逸出，出现了碎片化的声音。^①

但在内地语境中，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共同体及其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整合功能。一方面，它缝补回应社会政治层面的文化整合要求，建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整体想象，在华人性、中华性等文化维度上确立发言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使得自身存在状态从散存

^①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对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触摸，自然隐含与晚清同样的民族性诉求，一直承担文化整合的功能。然而，学术研究在系统化、整体化对象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裂缝和突破原有格局，意识形态的融合功能一直伴随着乌托邦的破坏力量。这种乌托邦的力量来自学术自身的求新机制，但与学术共同体内的具体运作机制直接相关。

走向整体化，并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传媒和文学创作编织成具有意识形态力量的网络，获得不断演绎发展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情境中，研究者不断复述我们所开启和所获得的东西，对失去和已结束的一切轻描淡写，破碎的尘埃被风吹散。在日渐壮大的研究队伍、日渐丰硕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语言和自己镜中的形象。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研究者奋勇前进时，可能遗忘了鞭策我们奋勇前进的时代之残酷性。这个时代不断开拓我们的视野，造就了无涯的学术之海，在这个浩渺的知识海洋里，我们研究领域的知识和对象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在累积，无边无际。我们沉浸其中，觉得可以为之牺牲毕生精力，甚至可以不要婚姻和孩子。可当有一天，我们在黑夜中突然醒来，发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其实不过是世界的一粒尘埃而已，与自我的生命状态也并无必然的关联，那时候，我们如何继续我们的研究呢？是再次编织充分的理由坚守阵地、还是在迷茫痛苦中慢慢放弃呢？更有意思的是，在当下的知识生产场域里，当我们所发现和制造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与学术风景，正在转化为“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或者“汉语新文学”等新的风景时，我们又该走向哪个场域呢？我们对于文学与空间的思辨方式是否需要重新检点呢？

对于研究者自我意识的如斯呈现，或许过于感性，却很真诚。目的在于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多一点点警惕！或许明白了自我和研究共同体的发言位置，也意味着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之局限所在。在此，我对自己说，当新的研究领域在远方呈现令人蛊惑的魅力时，不妨记住，我们的心是在帆动之前摇曳不已的，路，已经不是新的了，风景，不过给出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契机。

目 录

- 第一辑 理论意识及反思** (1)
- 一 接受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 (1)
- 二 “离散”之思——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 (10)
- 三 中国内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维度 (16)
- 四 学科之外:内地学者关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 (25)
- 五 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及转型 (37)
- 六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传媒”问题:以中国内地为考察中心 (47)
- 第二辑 传播现象及个案** (58)
- 一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传播的基本阶段与流变趋势——以文学期刊为中心 (58)
- 二 内地文学传媒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以文学期刊为中心 (70)
- 三 “世界性”的差异表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新马和香港文学期刊的华文文学传播 (81)
- 四 从余光中现象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典型主题的内地生成 (93)
- 五 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影视化传播的语境适应——以《北京

人在纽约》为例	(103)
六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网络传播现象略析	(109)
七 《特区文学》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117)
八 文学的现场印记——《小说界》中的留学生 文学	(130)
第三辑 文本解读及史论	(141)
一 从陈映真小说的“父性权威”看其叙事的“尴尬”及其 意义	(141)
二 叙事者的形象:剖析葛亮小说的一种视角	(149)
三 论《金山》的“传奇”及其意义	(153)
四 “第三种空间”的美学建构:试论张翎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 定位	(162)
五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历史流变与艺术特征	(172)
六 高楼中的说书人——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的历史叙事	(179)
七 白放情小说中的中国想象	(189)
八 诗意乡村与都市困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印尼华文 文学中的异族想象	(196)
九 《寄给祖国的诗歌》中的潜意识话语	(202)
第四辑 会议综述及访谈	(208)
一 第一届印尼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208)
二 创新·对话·发展: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述要	(211)
三 传媒、都市和文学——香港文学专题研讨会综述	(215)
四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年度综述	(221)
五 有行有思,境界乃大:“陈思和与世界华文文学”之访 谈录	(232)
六 寻找新的学术空间——王列耀教授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的思考	(241)
七 守望浮岛——与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的对话	(250)
后记——成长的印记	(257)

第一辑 理论意识及反思

一 接受心理与文学选择：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这一背景之下，台港文学率先涌入内地，其中一些作品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消费品，还出现琼瑶热、三毛热、金庸热等现象。随后以新移民文学为主体的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掀起一阵波澜，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的专业研究，也由碎片式探讨向学科化方向发展。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和研究体系都日渐丰富起来，现在，中国内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研究进入了深化与反思阶段。在我看来，反思的方法之一是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切入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原因在于，作为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接受者，读者（研究者是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也是一个独立主体，是阅读和产生意义的基本要素。研究这一主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流程，有助于深入了解特定文学的存在价值，那么，内地读者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有着什么样的接受心理？当文学作品契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而被流播时，文学又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构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试图从接受心理视角出发，以出现诸多热点效应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主要观测时段，对内地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接受史作出探寻。

（一）普通读者：注意指向中的潜在欲望

尼采认为，审美的方向和人的心理欲望的走向趋同。他说：“美在

什么地方？在我必须以全意志去意欲的地方。”^① 弗洛伊德也认为，审美（包括鉴赏与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在于主体的潜意识欲望，审美是这种欲望的象征性表现或替代性满足。^② 据此，分析普通读者的审美注意指向，可直入中国内地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接受心理场，剖析出其隐秘的深层欲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台港武侠言情小说涌入内地的黄金时期，这些质量不一、品位参差的通俗读物迅速占领了普通市民的阅读空间。台港文学品类繁多，但普通读者注意力为何大多指向这类读物呢？应该说，这些小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足以和内地文坛的某些作品媲美。但若从阅读者的接受心理角度去探讨，则不难发现，其诱因乃是内地极“左”路线造成的文化思想禁锢。“文革”前后，在极“左”路线下，全民看的是样板戏，读的是“高大全”。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是模式单一，以宣扬政治主题为主，给人教诲多于娱乐。改革开放之初，内地文学依然以精英文学的形式出现，奏响的依然是沉重和紧张的主旋律。（如对“文革”伤痕的反思实际仍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直接、紧密的契合）但人们的审美需求和阅读欲望是多层次的，其中，对文学艺术所持有的消遣娱乐心理期待，更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解放思想”的呼声和经济改革的步伐，人们的观念正悄然发生变化，因受商业社会影响，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趣味必然更重娱乐消遣性。显然，读者心理的这些变化尚未成为当时内地文坛所关注的主题。港台这些小说则以娱乐性标示自我，顺利进入了内地文化市场。当这些文本涌入时，人们在其中发现的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熟悉的是文本中尽情渲染的凡俗之情，陌生的是文本中异样清新的表达方式。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幽默活泼的语言、离经叛道的人物，让读者恍入一个远离现实政治，解脱心灵重压的武侠天地；琼瑶的言情小说，则直露激情和爱，制造了一个爱情唯上的世外桃源。这样，这些文学作品作为都市通俗文化的成分，与李小龙的功夫片、邓丽君的歌曲一样，以娱乐性建构了一个商业社会的虚拟时空，宣泄了内地读者心中固存但又长期

① 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② 陶水平：《审美态度心理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被忽视、被压抑的心理欲求。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另一主题——异域风情主题也成为内地读者的关注点。据审美心理学的观点，人们往往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没有兴趣，对过于熟悉的东西也产生不了审美意识。只有保持了恰当的心理距离，才会有审美的需求。此时，在对外开放的视角里，内地对异域逐步了解却未能完全走近。因此，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构成了一段适当的审美距离，触发了人们对“异国风情”的审美热情。而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常游走于国界和异邦之间，异乡异域背景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其作品的主要背景或是直接的表现内容。这些自然吸引了内地读者的眼球。尽管这种异国风情不一定是刻意引诱读者而设，但经过他们的文学想象后，异国多少染上了梦乡的色彩，赫然有了异国情调，令人神往。如三毛散文中的沙漠幻景、赵淑侠的小说《塞纳河畔》里的法国风情，黄景树笔下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均不同程度因想象而焕发异彩。

人们往往希望跨越狭窄而熟悉的生活圈子，接触到一些陌生而有趣的奇人异事、奇山异水、奇风异俗，以满足自己的好奇、窥视等认知心理的需要。但“异国风情”仅仅满足这种人皆有之的好奇心吗？照张远山的说法，中国人其实一直有一个流浪情结（吉卜赛情结）在封闭文化中受到最深最久的压抑。几千年的封建户籍制和保甲制，把中国人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并在儒家伦理的成文化育下，被合理化、理想化，“生于斯、长于斯”的定居生活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唯一的生活方式。^①改革开放前，这种隔绝状态基本持续着。在有关“异国风情”文本中，有关流浪与漂泊的场景本来是含义丰富的——苦涩与艰险、失意与痛苦交织。但这种“流浪的生活状态”给读者带来的却只是一种诗意和刺激感，苦痛的一面被不经意间忽视了。如三毛笔下的沙漠故事在内地读者心中已成为神奇浪漫的寓言。故张远山的论述给我们的启迪是，内地读者对“异国风情”的青睐，或许还源于集体无意识中“吉卜赛情结”的觉醒与躁动。

20世纪90年代初，新移民文学中有关西方世界的“物质神话”主

^① 张远山：《吉卜赛情结》，《书屋》1999年第4期，第52页。

题亦开始成为内地读者的关注焦点。1993年，根据旅美作家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很大的轰动。有人戏言“万人空巷”看“纽约”。产生全民效应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因素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有关“美国物质神话”的建构。主人公王起明和妻子郭燕赤手空拳跑到曼哈顿——“他们除了自己赤裸裸的身体以外，什么都没有。”^①可凭着自己的努力，居然成了连美国人也羡慕的大富翁——“就是那些商业上颇有起色的地地道道的老美，也都极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说：‘这小子，来自大陆，非常成功；才四十岁，就什么都有了。美国梦，在他身上实现了！’”^②

当时的中国人都在做一个梦，梦想凭自己的勇气、才智和勤劳获得财富。《北京人在纽约》就烛照了中国人这一美梦。这种源于实际欲望的社会心理，转化成一种审美积极性，激起人们对同类作品的兴趣。如在此之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曾掀起一股热潮。——“许多读者一边看书，一边流泪，并在内心燃起为改变命运为实现自身价值和祖国繁荣而奋斗的理想火焰。”^③正如陈瑞琳所言：“虽然说早期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类作品失之于表现的新移民生活的浅陋，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发端开山之作，它们的问世，不仅强烈地刺激了海外新移民的创作，同时也调动了海内外读者对‘新移民文学’的热切关注，可谓功不能没。”^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透视世界的窗成为自由行走的门，内地读者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趣就开始分化了。

（二）文学研究者：审美分化中的身份焦虑

文学研究是一种深度传播，作为传播主体的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耕耘华文文学领域，一方面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新的领域不

①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③ 林锋编：《曾经沧海难为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前后》，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④ 陈瑞琳：《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当代北美华文文坛》，《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第11页。

容忽视，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文学研究困境中企图另辟新境的一个奋争。虽然他们和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不无相似之处，但作为专业研究人士，他们接受华文文学时更主动更富有意向性。因为批评家往往会对于丰富的文本世界进行简化和强化，选取其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阐发，如果他认为没有阐发价值之处就会忽略不计。所以剖析他们的审美焦点亦可是显现出其独特的接受心理。

由于各自立场观点的差异，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审美焦点。一类学者，重视相似性。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华文作家作品中的中国性、中华性。尤其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似乎对中国性的阐释成了情意结。如陈贤茂先生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从归属来看，应属于所在国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哺育下成长壮大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打开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五千年文化的芬芳，诸如儒家文化的伦理亲情，道家文化的无欲无求，禅宗文化的顿悟妙悟，以及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化意象，如故乡、明月、长城、龙舟、粽子、筷子、茶，等等。正是这些浸透着中华文化的作品的存在，才使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百花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①

而对相似性的注意，又使“乡愁和流浪，爱国爱乡、根”等成为主要的解读符号。比如李小平在2002年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菲律宾华文文学进行总体评述时，强调中国文化对于其的强烈持久影响而归纳出“寻根文学”这一术语便显现出这种解读思路的根深蒂固（《华文文学》2002年第5期《茉莉花种（Jasmine）来自中国——论80年代菲华文学中的“寻根文学”》）。尽管这些意象的确是这些文本的重要成分，这种解读也抓住了此类文本的精髓所在；但是，凡优秀之作，其内蕴应是极为丰富的，这种内在的意向性无疑也可能局限研究者的眼光，使他们缺少多角度去观照文本的意识。

如果说，这一类学者多从他者与自我的相似处去接受海外华文文学的话，那么，后来学者则逐渐重视相异性的审美和判断。如吴奕锜先生

^① 陈贤茂：《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第29页。

等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的文章中，提出要重视对海外华文文学内在本质与规律的研究，认为当前那种以“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之间联系为主要话题的研究，可能导致某种“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提出就是他们企图摆脱所谓“语言学种族思路”、跳出“相似性理论话语”的一种努力。表面看来，这种研究思路已经将“中国”悬置了，但实际上“中国”仍是潜在的参照系。何以言之？我们发现，这种研究思路的基点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海外华人生活是一种别样的、新型的、又自成一体的生存状态，是现像于普遍文化领域中的、近代以来新出现的、具有自身体格的人生形式”^①。而这种新型自足的人生形式自然会酝酿出一种属于海外华人自己的话语方式——即文化的华文文学。既然其基点是强调海外华人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凸显显然不可能没有参照系，那么，中国必然是最合适的参照系统之一。由此看来，这类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遵从各地华文文学发展的客观趋向，强烈反对把“他者”，一个已在异域生存的文化变种和“自我”混同起来，强调用差异的眼光审视之。

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一种较为灵活的视点来处理此类问题。如钱超英认为，中国内地某些研究者常以“中华性和中国性”为标签确定海外华文文学的性质是极为不妥当的。但他又认为，在某些新移民的华文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他指出：“当代海外华人在西方所遭遇的文化处境，和身在国境之内的中国人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大量困惑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②

于是，无论是解读相似性还是剖析相异性，或是折中的视点，“中国”都不可能不是显在或潜在的重要参照系。在解读中，海外华人无论是作为与我们类似的存在还是独立自主的存在，都已经将一个关键词抛出水面，那就是“身份”。近年来，它是华文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

^① 吴奕铸等：《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第8页。

^② 钱超英：《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序言》，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的一个词语，虽然“身份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兴起密切相关，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话语表达自然受到国际潮流和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但这种于智性支撑下的审美趋向，还折射出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接受心理呢？

王宁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一书中，曾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内地文学批评的困境和人文研究者的种种危机感。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感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乃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失真的一种忧虑。尽管“本真的中华文化”是否存在是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前提问题，但在多元文化冲突中，西方文化的所向披靡常使人文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本真性与走向问题极为忧虑。依照立普斯的观点，审美观照其实“就是这种把主观情感向客观事物移置或外射的活动”^①。联系到内地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状况，联系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参照立普斯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中“身份”问题的建构，多少也折射出一些研究者，作为民族文化的自觉代言者，对自身文化身份产生的惶惑与焦虑，这种研究也似有了几分“借他人杯酒，浇心中块垒”的意味。

由此，专业学者的这种审美指向，也暗示了普通读者接受海外华文文学的另一心理诱因。在同是黄皮肤、黑眼睛的海外华人讲述的家族史、漂泊史、致富史中，人们可能产生了一种错觉：作品中的华人被理所当然的与“我们”叠合，“他们”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样，一种代入心理阅读产生了，从而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这些主题与外国文学（异族异语言文学）中同类因素区分开来，海外华文文学也在内地读者群中获取了特殊的地位与意义。

（三）华文作家：对接受心理的反馈

荣格的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面具”它是指人在公共场所所展现的面具或外观，其意在于呈现于己有利的形象，以使社会悦纳他，荣格也称之为“从众求同原型”^②。一般而言，创作者也正是为了寻找一种审

^① 陶水平：《审美态度心理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② 转引自周秀萍《接受主体的能动性》，《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42页。